

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 在于提升居民消费与有效投资

陈彦斌*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存在“债务升高-核心 CPI 通缩压力-食品涨价较快-部分资产价格存在泡沫化迹象”的复杂格局,传统经济循环机制下的积极宏观政策容易导致衰退式泡沫和债务攀升。较高的宏观杠杆率抑制了消费与投资,会进一步导致核心 CPI 出现通缩压力。在实体经济和消费乏力的情况下,积极宏观政策所释放的资金流向虚拟经济,尤其容易导致区域性城市房地产泡沫。为了应对中国经济的复杂局面,有必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切实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尤其是着力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二是通过市场化机制着力提升有效生产性投资,而不是依赖房地产来稳投资和稳增长。

关键词：双循环;宏观经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投资

2020 年 7 月 21 日和 8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和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一、从超长期视角看,提出双循环的大背景 是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增长任务较为艰巨

目前中国经济在疫情后的复苏是不错的,但展望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增长形势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与压力。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2018 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和 2020 年的新冠疫情

*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育部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邮政编码:100872。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发展新动力研究”(项目编号:16ZDA006)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文责自负。

情不仅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格局,而且影响到了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速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到 2035 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以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刘伟和陈彦斌(2020)指出,2020—2035 年中国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至少要翻一番,也就是人均实际 GDP 年均增速至少达到 4.8%,才能完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 2035 年发展设想。作出这一判断,主要有三点理由:

第一,到 2035 年中国经济翻一番可以使得中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来看,2019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迈上 1 万美元大关,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 12 375 美元的门槛似乎已近在眼前。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有不少国家,比如巴西、阿根廷等已经迈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由于经济增速过低而且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也在不断提高,因而这些国家又重新回到中等收入陷阱。要真正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既要从根本上解决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问题,也要设定更高一些的标准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设定到 2035 年中国经济翻一番,沿着相应的增长轨迹行进,中国就可以在未来 6~7 年左右的时间点历史性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到 2035 年中国经济翻一番有助于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的前列。近十年来,中国创新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体现在创新数量和部分领域的创新能力。但是,中国的创新质量和核心创新能力与美国和德国等位居前列的创新型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的创新能力与其 GDP 规模存在相关性。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创新能力指数排在前十位的国家,2019 年人均 GDP 的平均水平高达约 5.4 万美元,是中国的 5 倍之多。设定到 2035 年中国经济翻一番的目标,中国人均 GDP 可以超过创新能力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的 40%,为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打下较好的经济基础。

第三,到 2035 年中国经济翻一番将大幅缩小中国与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为 2050 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打下坚实基础。虽然现在距离 2050 年还有 30 年,但也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与中等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尚存在较大的差距。剔除卢森堡、新加坡等体量偏小的经济体后,发达经济体人均 GDP 的平均水平达到约 4.1 万美元。如果以发达经济体的人均 GDP 平均水平作为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标准,那么当前中国人均 GDP 水平仅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标准的 25%左右。设定到 2035 年中国经济翻一番的目标,可以大致达到发达经济体人均 GDP 平均水平的 50%,也就是用一半的时间,实现到 2050 年目标的 50%,从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打下较扎实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潜在增速会缓慢下降这一客观事实与一般性国际经验,现在到 2035 年这前 15 年才完成目标的 50%,那么留给后 15 年的增长压力会更大,增长任务也会更艰巨。因此,设定到 2035 年中国经济翻一番只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基本要求,并非过高标准的要求。

但是,如果从目前的增长速度和增长轨迹来看,要实现未来15年平均4.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潜在增长速度是对过去的测算,不是对未来的测算,但是如果把对过去测算的规律与轨迹进行外推,并加以适当情景分析,那么可以对未来15年经济增长进行初步预判。刘伟和陈彦斌(2020)的测算结果表明,在没有其他外在因素大幅改变的基准情形下,未来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将在3.8%左右。这样的经济增速与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描述和所要求的生长目标与任务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从超长期视角来看,构建双循环战略有助于填补这一增速差距。

二、构建双循环关键在于调整经济结构 尤其是适当提升居民消费与有效投资

在目前经济结构与经济运行循环机制下,积极宏观政策容易导致衰退式泡沫和债务攀升。中国经济存在“债务-核心CPI通缩-食品涨价-资产泡沫”的复杂格局。较高的宏观杠杆率抑制了消费与投资,会进一步导致核心CPI出现通缩压力。在实体经济和消费乏力的情况下,积极宏观政策所释放的资金流向虚拟经济,尤其容易导致区域性城市房地产泡沫。猪肉价格上涨与气候等特殊因素变化容易导致食品价格高企的现象,比如,2020年8月的核心CPI只有0.5%,而食品价格同比上涨了11.2%。

在复杂的经济格局下,常规宏观政策效率较为低下。即使采用了积极宏观政策和创设直达实体经济的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也容易导致衰退式泡沫和债务攀升。这些年一方面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而另一方面泡沫在不断攀升,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的现象从来就没停止过,并且债务仍然不断攀升。这也是近几年为什么创建越来越多的非常规宏观政策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固然一定时期内、一定情况下,不得已采用大量非常规宏观政策有其必要性,但要认识到,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破解当前复杂经济格局的重要举措。因为这才能真正提高常规宏观政策的效率,才能真正解决非常规宏观政策所不能根本性解决的问题。

构建双循环的第一个关键在于,切实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从生产角度来看,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复苏较好较快。2020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6%,比去年同期水平还高一些。GDP是用生产法来计算的,因此GDP的复苏也是不错的,但这只是看到了表象。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57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0.5%,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实际增长更是远低于生产的增速。扣除汽车消费因素之后的消费增速还要下调一个百分点,因此消费乏力的现象依然是存在的。8月份,核心CPI仅为0.5%也佐证了这一点。

构建双循环的第二个关键在于,通过市场化机制促进有效生产性投资,而不只是靠房地产和新老基建投资。2020年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78834亿元,同比下降0.3%,降幅比1—7月收窄1.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14506亿元,下降2.8%,降幅收窄2.9个百分点。从环比速度看,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4.18%。

但是,要注意到当前投资增长态势还有一些假象:一是扣除房地产因素之后投资增速不高。2020年1—8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8454亿元,同比增长4.6%。扣除房地产后的投资同比下降1.76%,投资还是较为低迷。二是民间投资增速较低。2020年1—8月国有控股投资增速为3.8%,但是民间投资是-2.8%,两者相差6.6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整体投资的比重将近三分之二左右,这说明投资的主力与内生动力是不足的。而且民间投资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投资,如果扣除了房地产的民间投资,那么增速就更低了。三是从投资构成来看,“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的增速为-11.8%,而“其他费用”投资的增速是8.2%,两者相差20个百分点。这表明投资质量不高,结构不好,提升有效投资还存在较大的问题。2018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70%,但是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才44.8%,这个缺口还在不断扩大,这也佐证了存在无效投资。

三、如何提升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

近二十年来,国家从来没有忽视过提升消费的问题,但是,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一直较为低迷。1978年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尚处在47.8%的较高水平,到2010年则降至35.4%的历史最低点。2018年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仅为39%,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达到了58%。不管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和英国的居民部门消费率更是分别高达68%和66%),还是与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都明显较低。如果再考虑到收入差距问题,改用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基础性消费,那么消费率也许将会更低。即使与文化相近的国家如韩国、日本等进行对比,当这些国家居民收入处于中国当前人均收入发展水平时,其消费率也比中国现在高很多。

之所以出现长期消费低迷的现象,是因为中国采取了高投资高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注定了中国投资高居民消费低的总需求结构,而且在以前全球化红利不断释放的有利格局下,这一结构不断被强化(陈彦斌,2020)。由于内部需求相对较低,生产大于内部需求,那么就只能过度依靠外部需求和外部循环,而外部循环在当前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在继续努力做好外部循环的同时,建立双循环的关键在于提升内部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

要真正提升居民消费,需要用改革的办法做好如下几点(陈彦斌,2019):一是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方面入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新世纪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并长期处于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上。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中国收入差距可能会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由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过快转为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下滑过快。一个国家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都很重要,但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可能更为关键。虽然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但是他们的消费能力相对有限,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小。因此,需要依靠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来扩大全国消费能力是十分有必要的。二是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居民部门住房债务负担,降低居民债务对消费的抑制作用。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55.2%,高出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约12个百分点。如果采用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计算,2019年中国这一指标已经高达128.5%,超出美国同期水平20个百分点左右。三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根本性地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居民才能降低预防性储蓄、才能敢于消费。

参考文献:

- 1.陈彦斌,2019:《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中国金融》第17期。
- 2.陈彦斌,2020:《中国构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新模式的战略意义与关键举措》,《江海学刊》第5期。
- 3.刘伟、陈彦斌,2020:《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The Importance of Increasing Residents' Consumption and Effective Investment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Chen Yanbi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Chinese economy has a complex pattern of “debt increasing – core CPI deflationary pressure rising – food price rising – some asset bubbles expansion”. Activ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under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cycle mechanism can easily lead to recessive bubbles and debt rising. High macro leverage ratio inhibits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which will further lead to deflationary pressure on the core CPI rising. When the real economy and consumption are weak, the funds released by the activ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flow to the virtual economy. It leads to regional urban real estate bubbles easil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China's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gradually form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cycle as the main body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The key to building the dual circulation lies in two points. Firstly, increasing th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levels of residents through income distribution reform, especially th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levels of middle-income group. Secondly, improving effective productive investment through market-based mechanism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real estate to stabiliz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Dual Circulation, Macro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vestment

JEL Classification: E2, E6

(责任编辑:彭爽、郭楚玉)